

※採訪報導※

柳存仁教授的學思歷程

楊晉龍訪談* 孟慶華整理**

時間：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柳存仁教授是澳大利亞的華裔學者，民國六年（1917）在北京出世。他於193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國文系；後來曾獲倫敦大學榮譽文學士（1954）、哲學博士（1957）及文學博士（1969）等學位。他是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的基礎院士（Foundation Fellow）。

柳教授於1962年從香港應邀到坎培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教書；曾任該校高級講師、副教授，1966年接任亞洲學院的中文系主任和講座教授，曾兩次被選擔任亞洲學院的院長；1983年退休，又被選做全大學的研究員（University Fellow）。在二十年間的工作歷程中，他曾被邀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夏威夷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巴黎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馬來亞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做訪問教授和訪問研究員。他又曾獲韓國嶺南大學、香港大學、澳大利亞墨篤克大學及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頒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柳教授也曾受邀訪問中央研究院本所，並作講演多次，他又曾應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的邀請，1984年在該所講道教史及訪問；去年（1998）五月他在北京大學發表湯用彤講座講演〈漢末的張天師是不是一個歷史人物？〉。

柳教授研究道教史和中國小說史方面有很多的著作。他的英文書

* 本所助研究員。

** 本所約聘助理。

籍，有《佛道教影響中國小說考》（*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62），《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錄》（*Chinese Popular Fiction in Two London Libraries*, Lung Men, Hong Kong, 1967），《和風堂論文選集》（*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E. J. Brill, 1976），《和風堂散策新集》（*New Excursion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E. J. Brill, 1984）及編輯《中國市井小說——清代及民初》（*Chinese Middlebrow Fiction - from th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s*,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1984）等；中文的學術論文集有《和風堂文集》（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和風堂新文集》（兩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7年）等。他的新書《道家與道術》，今年亦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

柳教授的一部分論文，像〈唐代以前拜火教摩尼教在中國之遺痕〉、〈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紅樓夢之舊本〉等篇，還有日文、法文的譯本。

一、是否可以請柳先生告知在求學過程中，影響最大的師長，以及影響的內容。

跟我有關係的老師，有些人是我很佩服的，可是沒有密切的私人來往。我跟這些教過我的老師，或是我去請教過的、見過面的，幾十年來這一類的老師也有一些；所以我比較受過影響的是大學的老師。中學的老師往往是不大著名的，有的老師可以幫助我寫作，有的老師可以幫我作點學問，可是那些都不是社會上所謂名人，說出來別的人也不知道這是什麼人。東吳二中的王冥鴻先生，光華附中的潘子端先生對我的知識都有過很大的啟發。中國可能有幾十萬這樣不大出鋒頭的老師。

比較出鋒頭的老師，我對他也還有很高的敬意，一個就是胡適之。胡先生是能說話的人，他擅長講話，也不一定有意要影響人，不過因為他說話有條理，眼睛有精神，他會不知不覺地影響人，他沒有意思要拉那些人去做羣衆。美國留學的人看見美國教授是怎樣的教法，也有影響，所以他在課堂裏的表現常常很像是個演說家。

另外一個當時還不像胡先生那樣出名的，就是錢賓四，他是我大學一年級時教

中國通史的老師。這門通史是幾個系的人全要上的，所以人甚多，可能有二百人，在一個大堂。北京大學有好幾個院，通常文學院上課都是在第一院，就是著名的紅樓啊！現在不用的了，因為現在的北京大學不用從前的北京大學的校舍，現在的北京大學的地點從前是燕京大學。當時北大有個第二院，叫做「松公府」，是清朝乾、嘉時代做過東閣大學士的蒙古人松筠（1752-1835）的舊第。那個大的講堂，就是那個府裏的一個大廳，有個戲台。上課的講師就是錢穆，他來講課，我們都坐在裏頭，有個黑板，也有個校工伺候。用這個講堂上課的老師有時候擦黑板，有的老師不擦黑板，所以有個老校工，他先來擦黑板。我們學生有時在黑板上亂寫字，那校工會寫「請各位老先生不要在上面寫字」。稱我們為老先生，這是地道的北京話。錢穆先生不帶筆記，只有一本薄薄的東西，他也不大看的，他就是講，他的語言在易解與不易解之間，因為他是無錫腔的國語，而學生有的是東北，有的是西北，有的是廣東，有的是上海，有的是蒙古。錢先生教中國通史，講義的體裁就很像是《通鑑輯覽》，這是他編的。雖然是他編的，可是材料主要是取自《通鑑》。他有時候在黑板寫了題目，譬如說「漢代之士人」這類的題目，一連串直講兩堂，他那時候四十多歲，我只有十八歲。那時學生也不大發問的，但如果你講得不太好或講錯了，或你講得好像高中教書的，學生覺得沒什麼意思，就可以走了，並不嚴格非要坐在那裏不可。學生上課是很鬧的，可是他上課學生不鬧，所以錢先生語言雖不易解，卻不是不能解，學生還是很佩服的。

今年北京大學出版一冊紀念過去百年校史的書，收了很多從前北大老師、學生寫的文章，其中也有我寫的，那些文章是我六十多年前寫的，裏面有談到錢先生及胡先生的地方。其他也有對我有影響的，譬如像孫楷第，是中國小說史的關係；周作人，因為散文的關係；余嘉錫先生，因為目錄學的關係；還有鄭天挺，因為他教我校勘，諸如此類。胡先生跟我有一點私人關係，因為他勸我寫小說史的文字，而且第一篇就登在他編的報紙的週刊，就是我寫的關於陸西星（1520-約1601）的文章。那是寫得很粗糙的。那時候我才大學一年級，我以為我也有一點小發現，寫了胡先生一定會刊出來，一定會說兩句好話；他沒有說，他說問題並沒有解決，還可以研究。我想了想覺得這也很公平，所以後來有相當長的時候我就繼續研究這個問題。本來那篇文章只有幾千字，後來我把它寫成一本書，而且是用英文寫的，所以這也可以說是受胡先生的一點影響。

那時候學生中批評胡先生的人甚多，當然讚美的也有，主要是因為中國思想界

的動態不一樣。胡適那一派在那時已經沒有像五四時代那樣領導的地位，在當時什麼人有領導地位也很難說，因為一般就批評政府，有很多的左派的活動、學生也搞運動。我們同學裏生活艱苦困難的很不少，有很多流亡的學生，從東北失去了土地、家庭，滿腹牢騷，都是極不滿意於現狀，精神高亢而苦悶的人。我們的學費很低，好像是十一塊錢，其中一塊錢是學生會費。我們也不大買書，因為有圖書館，而且多數有講義，講義有各種的做法，像胡先生就是印點材料；但是也有不是這樣的，像余嘉錫先生的講義是每年用的，就寫成了一本印得很好的書，不過沒有裝訂就是了。你拿學生證到講義股，他就發給你很厚一堆，都印得很好，你可以拿到南紙店，就是賣紙、賣筆的鋪子，叫他給你加個封面，也不過一、兩毛錢，這就是你的書了，這就是余先生的目錄學。你要是根本不唸書，可以一年不理它，等到年底考試，稍微用功些，多數也不會不及格。

在上課的時間，老師覺得要講什麼就極力去講，雖然大致上不會離題，但是也常有批評時局，或者和同事對於某一個有爭執的問題鬥嘴的，這在大學自由發揮不同的見解反是常事。而且那個時候的老師，我猜想現在這裏也還有一點這種情形，在國外就絕對沒有，就是一個老師只教一門課。譬如你教元曲的，你就以元曲名，元曲就等於你了；假如你是吳梅，在這個大學也是你，在那個大學也是你，在這個大學是專任，在那個大學是兼任，最初也沒有規定兼任的鐘點。當然啦，也許這個大學不是你，是一個比你差一點的人，或是你的高足。譬如你是吳梅，他就是盧冀野（前），譬如這樣吧，其實盧冀野說不定也很好。所以那時我們對大學教授的印象和後來的想法可能不一樣，我們在國外就更不一樣了。譬如楊聯陞先生在哈佛，我最初也不知道他在教什麼，因為我在哈佛只住半年，也不是很久，而且是朋友，我也不會去聽他上課，不過大家都說他很淵博。他何以變成很淵博？很簡單，他從助教幹起，往往有教授要依賴他，中國歷史悠久，情況複雜，西方人很多東西不大懂，所以楊先生就必須很懂，所以有些東西自己不頂熟的就要把它變熟，自己不懂的把它變懂，而且楊先生常寫書評，他自己也寫過一、二本好書，最有名的就是《中國貨幣與信貸簡史》（*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要批評人是極難的，起碼你要跟那個人一樣才能去批評，還要精彩，批評得不精彩，那個人不服，要是批評錯了，那就更麻煩。楊先生的 scholarship，除了在國內已唸過清華大學，他的日文很好，後來他在社會史方面和日本學者們可以辯論、可以寫文章，所以日本人都很敬重他，這都是從那種情形訓練出來的。以上說的北大，這是我唸書時的情

形。

我很佩服呂誠之先生（思勉），他是我後來在光華大學借讀時比較接近的老師，他也是錢賓四先生早年的老師，不過是另一種關係的老師，是以前在江蘇常州府中學的老師。有一年錢先生到上海，我請錢先生到光華大學去演講，他們師生兩人離別很多年，一個在北方，一個在南方，又見面了。呂先生對同事和學生都很親切，私人間常有來往。星期天早上或中午，常有年輕的講師，如楊寬、童書業及少數四年級生來一起喝茶，喝茶大概自己要出錢的，目的就是見見面，談一談，所以呂先生我比較熟。還有一個老先生我很熟，即蔣竹莊先生（維喬），他寫過不少佛教方面的書。他是佛教徒，他最有名的書，到現在還有人提的，叫做《因是子靜坐法》，就是一天到晚講導引，這書蔣先生學的是早年日本人岡田的程序。這個老師清末曾和莊俞先生替商務印書館編過國文課本，民國成立時他是南京政府教育部的秘書長，總長就是蔡元培。他提倡印《大藏經》、《磧砂藏》，如果說要印《道藏》，他也會贊成的。他教我的時候，好像接近六十歲，大概九十歲時才去世。

二、是否可以請您簡述一下學術研究的過程和心得，包括您在什麼機緣下前往倫敦研究，以及寫了《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錄》這本書？

是在 1949 年之後。當時香港的大學只有一個，就是香港大學，是民國元年成立的。香港大學也有中文學院，我不是那裏出身的學生。早年香港大學中文系請的老師都是點翰林、登科甲的人，譬如賴際熙（光緒二十九年進士），是廣東增城人，住在香港。港大有新觀念，是從許地山、馬季明（鑑）這些人從北方受聘來之後才開始的。許地山本來在燕京大學，他是留學英國的，我在 1940 年認識許地山先生，那時我對道教的研究還沒有粗淺的知識，雖然曾聽陳寅恪先生說及道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我受過許地山一點益處，就是我後來常有機會用過他的佛教和道教的藏書，這些書在他死後透過別人賣給了我工作的大學，我有時候用的書就是許先生的書，他的書還蓋有面壁齋或其他文字的圖章。我認識他的時間很短，因為不久他就逝世了。

五十年代的時候我在香港一個中學教書，因為是北京大學的畢業生，香港政府就承認你的學位，但也就如此而已。它給的工資，比香港大學畢業要少一點，我就很不平。要怎麼樣才可以平呢？你現在讀的是個英國聯邦承認的洋大學，就可以平

了。英國倫敦大學每年在香港考試，先要倫敦大學接受你這個申請，你再去考試。考什麼呢？先考它的第一個學位，就是 BA，就是大學學位，還要寄北大的照片、成績單等等證明文件，有一年我就去考了，也考取了，我就得了倫敦大學的第一個學位。因為倫敦大學要得博士學位、碩士學位必須有他的頭一個學位，不然不給你去應試的。我一面做事一面讀書，要申請考他的博士學位，就一定要到英國去，所以去英國的緣分不過如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英國的制度很少有博士，MA 即碩士也很少，而且制度也很怪，有的大學本科一畢業就是碩士，我們中國人不知道，因為碩士仰之彌高啊，博士仰之更高，其實，英國人不很重視這些。當然，像樣的國家都重視學位，這沒問題，所以它的博士你外面的人可以去考，但先要有他的第一個學位。我去那邊就要先跟它的教務長通信，提出申請。一定要做一本題目經過校方批准的論文，最後要親身去答辯。我最初提的題目要做一本字典。做一本什麼樣的字典呢？宋朝不是有一派理論說中國文字有聲音的部分（聲符）也有意義的麼？因為要做論文，我曾經自己做了一本字典，跟普通查部首的字典不一樣。後來倫敦大學的教授 Walter Simon 跟我講這個做出來沒有人可以審查，所以我就選了小說史的題目。1957 年我到倫敦參加口試，口試時考我的只有兩個人，一個就是 Walter Simon，他是德國籍猶太學者到英國做教授，是有名的語言學家，他懂很多語言，漢文、蒙文、藏文、滿洲、日文、韓文、梵文等十幾種語言，另外考我的是一個中國教授賴寶勤，可是和英國人結了婚，所以改姓，叫 Dr. K. P. K. Whitaker，這兩位跟小說史沒有關係，實際上有另外一個主考的人叫 Dr. Arthur Waley，英國著名的漢學家。考完之後，Walter Simon 先生就給我一封信，希望我去看 Waley，是 Waley 給我的信。由他轉交，這是另外一種私人的事，所以我認識 Waley。後來我寫的書，有的是他寫序，他寫的書有時也偶然提到我，就是這種關係。

我住在倫敦總是要做點事，所以我就寫了那本《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錄》，其實是一本英文書，那本英文書就把我所見的英國博物院、英國亞洲學會所藏的明清小說，大概都看過了，每一本都做了提要，提要只表示看見什麼而已，並不是我要拿它跟什麼比較。後來我從香港到澳大利亞去工作，才有一篇篇文章做出來，因為那時學院裏有書要出版。書是英文，但有中文提要，因為講版本不用中文，人家還是不曉得書是什麼樣子。這書的〈提要〉1982 年北京的書目文獻出版社把它拿去出版了；事後我才知道。我的博士論文就是寫佛教和道教影響了中國的小說。

三、那您在什麼機緣下對研究佛教、道教有興趣？

現在也還有興趣，因為我研究《封神演義》的作者，文學史上說的作者一直是許仲琳，沒有人認為是陸西星。可是在我念大一時，有些學者，如孫楷第先生、胡先生、張政烺先生也都發現了新材料，即《傳奇彙考》裏有一條講《封神傳》的作者是元朝的一個道士陸長庚。陸長庚實際上是明朝陸西星的號，他的名字的來源就是《詩經》上的「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所以他叫西星。後來我們又從方志，譬如江蘇《興化縣志》、《揚州府志》知道陸西星是明嘉靖萬曆間一個科舉考試失敗的讀書人，後來去做道士，但詳細情形還不了解。但是如果你跟道教人物或道教的書多有接觸，關於陸西星的事知道的就會更多了。後來慢慢我就知道陸西星有一部書叫《方壺外史》，專門講男女雙修這一類的語言，因為是文言文，讀起來很麻煩。還有一部書即《南華經副墨》，倫敦大學圖書館現藏的那一套還是我送的。他還寫些別的書，佛教的《續藏經》有兩、三種他的書，專門研究《首楞嚴經》，所以這個道士是傳統的讀書人，對佛教有興趣，因此要研究這個人，不得不有一點佛教及道教的知識。尤其是道教的東西對我有一點吸引力。因為沒什麼人研究它，香港大學那一套《道藏》當時似乎很少人用的，我常常用，因為這個緣故，很多年後我也買了一套《道藏》放在家裏。

四、請問柳先生怎麼會想到澳洲？

1962年我還在香港時，Walter Simon先生給我寫信，希望我到倫敦大學教書，但他只請我三年，所以我考慮之後沒去。沒去也很可惜。有人說香港是彈丸之地，當時和臺灣有隔閡，和中國大陸是不通的，香港政府的人去大陸先要得到批准。香港在英國殖民地的時代很注意教員，因為教員和思想有關，香港一般都沒有了不起的思想、沒有政治，很像一個無國籍的人。我去歐洲旅行的時候拿香港政府的證件就等於是個無國籍的人，你可以去別國旅行，但往往把你的證件輪在最後一個，因為你所拿的不是護照，人家都是護照。我在澳洲做事，還有一個私人的原因，因為我兒子在澳洲念書。我問澳洲聘我三年之後怎麼樣？教務長回答若聘三年後很好，一定可以聘到六十五歲，因為這個條件我就去了。我們坐船去，因為行李書籍較多，當然拋棄了十幾年的固定工作出遠門，也有點冒險，可是我知道澳洲有

些人學問做得不錯。

我剛去時很失望，我那個大學當時亞洲研究還沒有稱學院，叫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是幾座木頭平房，不像別處是堂而皇之的大樓，我在香港工作的地方也有大樓，就覺得這怎麼叫大學，雖然別的學院設備也很好，只有我們的這樣。我進去住了兩、三個月就覺得不用管房子了，因為同事都很有學問，除了教中文、日文……等語文和歷史，他們的藏書很多，我對他們有些敬意，因為那才像讀書人。我們的系主任馬悅然（N. G. D. Malmqvist），他就是高本漢的學生。我的職級是 senior lecturer，即高級講師，做了一年左右就升為副教授，再過一年，馬先生就離開那個大學，因為他的老師老了，要他回去繼任，後來我去過瑞典就是他的關係。

在外國教書，幾乎要你什麼有關的東西都會教，所以要先有心理準備。但講的不一定要很深，最好能適合用功的學生們的程度，逐漸地由淺入深；其次外文要好一點。我們這時有五個系：中文、日文、亞洲歷史、佛教語言、印尼馬來亞文，後來又添了朝鮮文和越南文。

五、又請問怎麼會去美國？

我怎麼會到美國，因為 Malmqvist 先生走了以後，我就代理系主任，Malmqvist 先生在時請助教教學生語文，是每年一聘的，我做時也請。可是那時大學有兩部門，一部門是各科的研究所，一部門是大學本部五個學院，上面也有一個叫做校長（Principal）的教授，是澳洲人。等我請助教時他就挑剔，說我請得多了，其實人數並沒有增加，所以就有點衝突，他就說你要是不喜歡也可以不做，我認為他是欺負我，那時我就立意要離開。過了幾個月恰巧有一個朋友叫房兆楹，本來是我大學圖書館的副館長，也教目錄學的課程，是清史專家。他到美國要編明人傳記字典，他跟哥倫比亞的同事來信說請我去教書，同時要開一個明朝思想史的課，他們就請了日本的岡田武彥及香港的唐君毅等，就這麼四五個人，日本方面後來還請了一個酒井忠夫。我就跟我大學講，也沒有辭職，就停薪到美國，找另一個朋友佛教語言系的 J. W. de Jong 教授兼做中文系代理工作，我就到美國去了。到了美國就在紐約住下來，所以我認識陳榮捷、夏志清、劉子健等人。當時我在班上講一些明代道教和思想史的題目，從校外來聽講的有杜維明、陳學霖等，都比我年

輕，還有來問問題的。陳榮捷先生是個很溫和、儒雅、敦厚的人，我跟他共用一張桌子，我們也跟兩個人同房間，一個是蔣彝，一個是夏志清，他們兩人同室，我跟陳先生是客人，我經常要上課，陳先生每星期五從他的 Dartmouth College 來上課，所以才兩人合用一桌。我有時也到別處演講，就多一點錢，多認識一點朋友，附近的幾個大學都去講過。我自己用《道藏》的材料講書，就在這個時候。

十幾年前我去過哈佛，請我去的就是楊聯陞，我們兩個人本來打算合寫一本書，後來因為聯陞先生生病要住院，是腦部的病，我就一個人寫了那一本書，即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注的《道德經》的研究，寫好我就印了一個副本送給聯陞。他在醫院住了半年左右，因為他需要靜養，我也沒去看他。在瑞士有一個研究佛教和中國傳統學問的大學者，後來成為法國公民，就是戴密微先生（Monsieur Paul Demieville），戴是聯陞的朋友。1973年時，我在巴黎住了六個月，那時在休假，戴先生就請我和內人去他家住，他家在瑞士 Mont-la-ville，我們住了幾天，楊聯陞夫婦也來了，就一起住在這座本來是戴密微岳父的房子，在半山上。戴先生的太太過世了，所以他一個人住，這是最後一次和聯陞在一起。戴密微那時翻譯王梵志的詩和其他的變文資料，就拿出來給我們看看有沒有意見，同時戴先生那年出了一本關於禪宗的書 *Entretiens de Lin-Tsi*。

六、想請問您對臺灣的道教史、小說史和儒家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有何看法和建議？

你這個問題我可以試著回答，但答得好並不容易。我來臺灣六、七次，但沒在臺灣住過，所以對這些事情不會深入，我唯一知道這裏宗教性的活動是1989年，龔鵬程先生在淡江大學工作時開了一個民族宗教的研討會，會後有一次遊覽，到臺中、鹿港一帶，每一種宗教都讓大家見識一下，遊覽了三天。我發現這些宗教的團體、機構，有些道教和民間宗教不容易分，有些神本來是道教的，但特別拿出來為他或她造一個廟宇，就變成不容易知道背景，雖然研究道教的人還大概可以知道。例如王靈官，我在臺灣聽一個研究道教的美國人說王靈官還可以出會啊，某些信仰還可以有像美國的 festival 之類的活動，這些和書上的記載當然有些距離。

根據我的理解，臺灣的道教大概是從福建、江西來的，有一個荷蘭教授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就在臺中做過道士，他所學的就是一系列的法事。前幾天王秋桂先生送我他編的書也是福建武夷縣做法事活動的記錄，我想臺灣這部分

很強，也許應該發展它強的地方，變成一種民間活動，這種民間活動有時很有意思。我看周作人的書講日本人祭日出會那一類的活動，神像出來坐在好像大轎子裏，十幾人抬轎，嘴裏還唱歌，突然轎子不動了，後來有神的命令才可以走。我看《道藏》，南宋有一個道士白玉蟾，他在《道藏》裏有《上清集》、《武夷集》等文集收在《修真十書》裏，據他的《玉隆集》內一篇〈續真君傳〉裏的記載，也有這種現象，所以我想民間信仰我們還沒研究得太科學的，但記錄不會太假，因為南宋時的中國和二十世紀的日本是不同時期的。這是我對道教的動的方面的一點了解。

還有一種現象，即古代的巫。譬如現在道教有上刀梯，恰巧昨天晚上饒宗頤先生給我看一本聲韻學的書他寫的序，要我提提意見，序裏引了劉繼莊的書。劉繼莊的《廣陽雜記》裏都有湖南人上刀梯的描寫。這是清初。今天在中國大陸或許是沒有這些了，新加坡或許沒有這個知識，所以我想要研究道教史，臺灣有些地方可以給外面的人一些幫助。定期的刊物例如臺南的丁煌先生編的《道教學探索》雜誌，裏面就有好些研究文字可供人們參考。

在小說方面，小說史的研究是很發達的。很多年前靜宜文理學院出了一大套小說研究的書《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後來清華也出過一套，書的作者多數是在大學裏講小說、文學或小說史的人，例如胡萬川、王國良、王秋桂、馬幼垣……等人，真是濟濟多士。還有你們所裏的李豐楙先生，是又研究小說，又研究道教的。聯經出版那一套叫做《小說戲曲研究》的叢書，為什麼現在沒有了呢？那套書我也寫過一篇文章，我希望有人還繼續辦。

七、請問澳洲的漢學研究如何？

我退休已十五、六年了，新的系主任、朋友，年輕一輩的，有些可能是我的學生，現在很難確實知道他們有什麼研究新計畫。倒是我工作的二十多年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你有什麼活動，包括紐西蘭。因為我在的時期是澳大利亞經濟比較好的時期，我的大學和其他幾個大學都預備研究中國的發展。先是和臺灣有外交關係，後來和大陸有外交關係，現在和大陸雖然有外交關係，但和臺灣還有經濟文化等關係，就是在關係很不明朗的時期，對海峽兩岸也沒有斷了來往。臺灣當時在澳洲的外交官陳之邁先生，是晚清大學者陳澧的曾孫，傳統東西知道的很多，我做大學生

時他是大學教授，年紀很輕，最初在清華大學教中國政府，他們這一派的人回國後都有意在那時政府的條件之下促進國家的現代化，後來沒做成就打仗了，有些人就被引進政府做官。

我那個大學的同事們在學術方面的貢獻主要發表在全世界的刊物，因為它們是用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寫的。最初我去時我們學院還沒成立，這個大學是戰後才成立的，最早是以研究所為基礎，預備辦一個大學，專門研究空洞或實質的問題，純粹研究性的，可以不教書，但要做實驗、寫書、做 research，大學本科的老師要教書，也要做 research。最初因為沒有這大學，所以就從歐洲請人來主持。第一個被請的是高本漢的學生 Hans Bielenstein，他很特殊，是瑞典人，研究中國漢朝的歷史，他寫的好幾本大書就講漢朝的長安、洛陽等，後來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他走後就請 Malmqvist 來，他是研究語言文字的，所以中國話說得不錯。在他們二人影響之下，很多別的同事，都是當時已很有名的人，其中一位 Otto van der Sprenkel 研究明代歷史，研究《明史》的〈七卿年表〉這一類的制度、組織的問題很著名，他還研究傳記。其他的人，現在還活躍的，譬如承接 Bielenstein 衣鉢的 Rafe de Crespigny 專門研究漢朝歷史，研究東漢三國，所以他翻譯《資治通鑑》中三國的歷史，也翻譯《三國志》中的《吳志》，從中取出材料寫三國中孫堅、孫策等南方人的歷史。有二位朋友，一位叫 Donald Leslie，他最初研究中國歷史，但特別注意開封的猶太人，關於這個題目也有很多別人研究，你到開封還可以找到這些人的後人，這些人在明朝還有人中過進士；同時他又研究回教的事情。另一個人 K. H. J. Gardiner，他們二人寫過一本英文書叫 *The Rome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中國史籍中的羅馬帝國》），研究當時中國知不知道羅馬，知道的是不是羅馬，或知道的是什麼樣的羅馬，這本書去年才在羅馬出版。另外有一個義大利人 Igor de Rachewiltz 研究元史、蒙古史，是我們大學畢業的，他的祖母是俄國人，自己是義大利人，所以他對蒙古人從元世祖開始統治中國的部分，及早期的《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窩闊臺等很有研究。他翻譯過《蒙古秘史》，還編元朝人的傳記，大概快出版了。還有一位 John Frodsham 是英國人，英文特別好，是從前 Waley 告訴我英國有四個人將來可以為研究漢學發揚光大的，一個就是此人，一個是 David Hawkes，是翻譯《楚辭》和《紅樓夢》的，還有一個現在已經去世了，叫 A. R. Davis，還有一個現在在美國研究唐史的 Denis Twitchett。Frodsham 寫過 *The Murmuring Stream*（《謝靈運》），翻

譯過郭嵩燾到英國做首任欽使的日記，也寫過關於李長吉的詩。

李克蒙（Pierre Ryckmans）是我的一個同事，他的名氣比我大，他是比利時人，本來研究古典中文，在臺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學過中文。他最初想到中國大陸，但大陸當時不接受，所以就在師大念書，也娶了一個中國太太。他的中國話很好，1969年我問他要不要到澳洲來，那時他在香港的新亞書院教的是藝術史，對美術很有研究，他有二、三個博士學位，一個是美術史，另一個是法律。到我們系裏後也寫了些書、文章，他得過法國的儒蓮漢學獎（Stanislas Julien Prix），儒蓮是從前法國的漢學家，所以我們大學立刻升他做副教授。某一年，比利時政府要他去北京做文化參贊，我答應他去二年。那時候是文革的後期，他在北京極不喜歡，曾寫了一本書叫《中國的暗影》罵當時的政府，這本書有六、七種語言的翻譯。中國大陸更不喜歡他來，直到四人幫失敗之後才表示願意請他去。但他又不想去，他的興趣恢復了他從前研究的古典，所以他把《論語》譯成法文，去年又出了英文版，現在正在譯《莊子》。我走之後他也不願意做教授，後來雪梨大學請他做教授，他就去了，但他最怕管行政，後來也離開雪梨大學，就專寫文章、作評論。這些書他都用筆名 Simon Leys 出版。去年寫過一本英文小說，叫《拿破崙之死》（*The Death of Napoleon*），在國際上也得了獎，這個人可以說有很高的才氣。

Bill Jenner 是很特殊的人，本來在英國的里茲大學教書，他也去過中國大陸很多次，翻譯過溥儀的《我的前半生》、《西遊記》、南北朝時關於佛教歷史的書《洛陽伽藍記》，所以他的古文很不錯，他就是我的後任，我退休四、五年沒有請教授，後來請了他。

狄庸（J. W. de Jong）是我很佩服的人，佛教的各種語言他都研究，但並不研究佛教、佛教歷史，他教書就教梵文等少數古典的語文。他一直編《印度伊朗研究》，這個雜誌主要是中亞西亞的語言、佛教等，是世界性的雜誌。人非常之好，樣子像羅漢。有一年我們去四川爬峨嵋山，他看上去身體最好，但不敢上山，還是撤去我們先下山去休息了。他的學問很好，日本人佩服的研究佛教史的歐洲人有二個人，一個就是戴密微，戴密微去世後就是此人，所以他每十年一定被邀請到日本去一次，看看十年有什麼變化、動態。

王賡武是在印尼出世的華僑，他是倫敦大學出身，博士論文研究五代史，後來的研究跟五代沒有關係，研究華僑歷史。他本來在馬來亞大學教書，有一年被請到我們學校來做遠東歷史系的系主任，做了好幾年，後來就去香港，做香港大學的校

長，在香港也住了好幾年，香港快要回歸中國的前一年就轉到新加坡，現在做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賡武的英語說寫都是第一流，卻很少人知道他的中文也很不可及。他父親王宓文先生是段懋堂的《說文》之學的，可以說是家學淵源。

八、紐西蘭的漢學研究如何？

紐西蘭大學很少，但有奧克蘭大學，經常設有教中文和一些亞洲語文的課程。有很多紐西蘭人在澳洲做事，因為兩國就像美國和加拿大一樣，可隨便出入。紐西蘭有一個學者 Noel Barnard 是我校的畢業生，後來就在我們學校工作，不過現已退休，是研究金文、甲骨文的，研究學問很專心，因為耳朵不行，就沒有雜念。有一年我有一個學生叫閔福德（John Minford），就是翻譯《紅樓夢》後面四十回的英國人，到奧克蘭去做教授，因此我也被邀去過那裏的圖書館，替他們做顧問。他們的圖書館相當好，但是和許多別的圖書館一樣，總不免還有可以補添的書籍。在這個意義上，他們雖然還沒有出什麼了不起的學者，進展也很正常，所以如果你們想交換或來往也很方便，可以給他們寫信。我知道他們有人研究過近代史、研究過張菊生先生（元濟）等，那邊也有中文的報紙，至少有一位編輯是從上海去的，本來在古籍出版社做編輯，學問也不錯。國外人雖不多，但也有一、兩位學者可以交談的。人不可看表面或徒看名聲，要切切實實地做事，學校恐怕也是這樣。

九、最後是否可以就您的觀點談談您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狀況的看法及期許，及您對我們所內刊物的觀感和建議？

我也給你們寫過一點文章，現在還繼續寫，所以有時別人的抽印本來了我也很慎重地看。你們編得很仔細，有時候太仔細了，例如某人引一篇文章，什麼書、什麼出版社、第幾頁到第幾頁，但在我看來，有些書沒有這樣記錄的資格的，就是沒有了不起的意義的，因為有些書的內容其實是一樣的。譬如引用《大藏經》，很少引用木版的《大藏經》，多數引用日本的《大正藏》，這書多數圖書館都有，也有標點，當然標點有時也有錯誤；這一類寫個出版根據當然可以。但有的書幾十年來都有好些不同的排印本或影印本，內容一定可以知道相同的，而且現在還有麻煩，例如引用梁啟超的同一部書有好幾個本子，你把它固定成你那個時代出版的，如何

可以？有的人就會認為梁啟超是現時還活著的人，其實已經死了很多年。還有，有時你們會追問一定要知道是那一版的，那是很難的，因為有的人引的書他自己沒有。我現在經過好多痛苦才知道，任何要引的東西必須去看原來那本書，有時古人引的東西都還有漏洞、錯誤，古人都不在乎，我們卻應該在乎。我們何不在需要很仔細的時候很仔細，不必那麼仔細的就不必斤斤計較，就算有一個字不同，對學問的結論影響也很小。

第二，現在像你們出版的《集刊》這樣的刊物已經很少了，某些大學的刊物可以比較一下，另外，日本有歷史的刊物也可以比較，可是我們不要比賽似的，每篇文章好像要打勝仗似的。我不很喜歡關鍵字，但我了解關鍵字的重要。

你們如果要國際化，要出些英文書籍。因為文哲的範圍實在很大，能有計劃也好。日本有些雜誌，其中有些老輩寫的文章已經不那麼多，但還是有幾個，中國也是這樣。你們出的一些書籍，都是很好的。

我去過中國大陸數次，自然從前也在那兒住過。大陸有些刊物還不太穩定，也不能說那些是代表性的，可是有些刊物很好，但因為錢的關係，常常脫期。新刊的《燕京學報》很像是要振起頹風的樣子。你們有錢，人力物力條件都好，可以好好做。海峽兩岸可以互相觀摩，互相研習，一個國家出的印刷品的精細與否，跟國家學術的程度成比例。